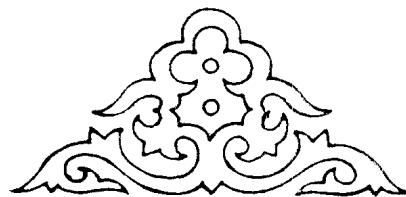


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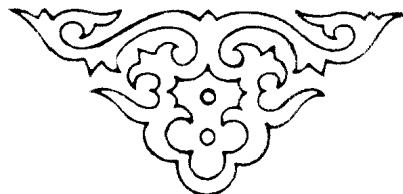
天津人民出版社

K248/2



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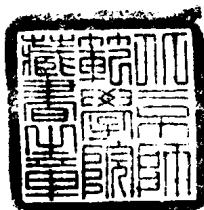
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秘书处论文组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873704



873704

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秘书处论文组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3毫米 1/32 印张 36 3/4 插页 8 字数822,000

一九八二年七月第一版

一九八二年七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000

统一书号：11072·84

定价：(精)7.24元

1980/2/2

前　　言

为了加强各国明清史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增进友谊，繁荣发展明清史学术研究，由南开大学于1980年8月5日至8日，在天津召开了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根据协商，大会设组织委员会，由郑天挺任主任委员，王钟翰、（以姓氏笔划为序）王赓武（澳）、王德昭（香港）、刘大年、吴廷璆、何炳棣（美）、岩见宏（日）、范德（美）、傅衣凌、谢国桢、蔡尚思、戴逸、魏宏运任组织委员；设秘书处，由魏宏运任秘书长，逢诵丰、王大璐任副秘书长。

应邀参加讨论会的共有八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百二十六名专家、学者，其中：日本十四名，美国十二名，澳大利亚二名，瑞士一名，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二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一名，香港地区二名，中国九十二名。

大会共收到论文九十二篇，近二百万字，广泛探讨了明清两代的典章制度、人物评价、秘密宗教、民族、阶级关系和民众运动等问题。会议期间，在全体会或分组会上宣读的论文共七十六篇，各国代表并介绍了本国的明清史研究状况。提交大会的论文和发言，大多具有新观点、新资料，有的还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为了将这次明清史学术盛会的成果，贡献给全世界的明清史学者和关心明清史研究的人士，根据与会者的意见，大会组

织委员会决定出版会议论文集。这便是这部《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的由来。有些论文已经发表，本文集没有收入。

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
秘书处论文组 1981年1月

目 录

- 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论明清时代 傅衣凌 (1)
研究清史的科学意义 刘大年 (12)
明王朝初期 (1350—1425) 的政体发展
..... [美]爱德华·L·法默尔(范德) (16)
试论明朝内阁制度的形成和发展 关文发 (45)
明代的内阁 李天佑 (66)
明代的宗室 顾 诚 (89)
关于“乡绅” [日]寺田隆信 (112)
试论明后期的东林党人 许大龄 (126)
清代的科举入仕与政府 香港王德昭 (158)
清代的幕府 郑天挺 (188)
清初利用汉族地主集团所施行的统治政策 谢国桢 (227)
清朝的政治制度 李燕光 (248)
清代的祭堂子 傅同钦 (269)
试论清代等级制度 经君健 (286)
清初“逃人法”试探 孟昭信 (320)
清政府对立宪的准备
——清政府对宪政的理解
..... [瑞士]诺柏尔特·麦恩北 (355)

- 论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清末立宪派 林增平 (370)
翁、张交谊与晚清政局 章开沅 (395)
对宣统政局的若干考察 李侃 (420)
均徭法、九等法和均徭事例 [日]岩见宏 (448)
从一篇碑文谈到明代农民的徭役负担
——读万历三十九《无年锡县均田碑》 范葛计 (464)
明代两畿鲁豫的民养官马制度 南炳文 (479)
试论明代的漕运 彭云鹤 (516)
明代江南水利政策的发展 [日]川胜守 (536)
明代江南之圩田水利与地主佃农关系 (提要)
..... [日]滨岛敦俊 (549)
关于明末就藩王府的大土地所有
——以潞王府为例 [日]佐藤文俊 (555)
明末清初“绅士”的土地经营
——以张履祥为例 [日]伊原弘介 (567)
公元十六世纪的中国海盗 李洵 (575)
“拖克索”浅论 魏千志 (593)
明清理学评议 任继愈 (618)
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新思想
——明清思想界的分野和创见 蔡尚思 (624)
明代道教音乐考稿 陈国符 (632)
论清入关前都城城郭与宫殿的演变 铁玉钦 (637)
沈阳太平寺锡伯碑文浅释 王钟翰 (659)
评《康熙皇舆全览图研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傅吾康 (674)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胡隽吟译
试论万历民变 刘志琴 (678)

乾隆十七年马朝柱的反清运动

——中国民众的乌托邦运动的一例

.....[日]铃木中正 (698)

[日]小山澄夫译

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 陈生玺 (715)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天津地位的变化 林树惠 (745)

义和团问题辨析 陈振江 (760)

陆西星、吴承恩事迹补考 [澳]柳存仁 (797)

大学士严嵩新论 [美]苏均炜 (822)

张居正的经济思想及其整理财政的措施

.....徐明德 (863)

李自成赋税政策研究 王兴亚 (885)

论李自成的军事思想和指挥才能 蒋祖缘 (905)

多尔袞对满族封建化的贡献 郑克晟 (931)

康熙与自然科学 闻性真 (950)

论清世宗的思想和政治 冯尔康 (981)

清代皇商介休范家

(《红楼梦》故事史证之一) 商鸿逵 (1009)

明太祖和城隍 (摘要) [美]戴乐 (1021)

关于天地会历史上的若干问题

.....刘美珍、秦宝琦 (1023)

天地会的起源 张兴伯 (1040)

关于白莲教运动性质的考察 [日]野口铁郎 (1053)

白莲教与四川的农民起义

——兼论宗教在农民起义中的作用 黎邦正 (1072)

清茶门教考析 喻松青 (1087)

十九世纪中国教派对基督教的影响

.....[美]丹尼尔·赫·贝斯 (1114)

建国以来明清史料的整理概述 赵守俨 (1133)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明清史研究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傅吾康 (1155)

附：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在天津召开 (1164)

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 论明清时代

傅衣凌

明清时代（十四世纪——二十世纪）是世界史上的一个大转变时代，从欧洲来说，它是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时期，而在中国也是一个大转变时代，她处在封建社会的后期，资本主义生产开始萌芽，但未能顺利地向前发展反而转落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地位。本来，在十四世纪以前，中国在科学技术、文化诸方面，都走在世界的最前面，为什么明清以后反而出现长期的迟滞状态呢？

关于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性和迟滞性，原因是很多的，兹试论述拙见如下：

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大帝国，这个封建帝国由于地大、物博、人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阶级关系错综复杂。它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的道路，但又没有背离一般历史的共同发展规律。那就是中国历史发展有其本身的特点，既不同于马克思所说的欧洲社会、日本社会，也有别于其他亚洲国家，如印度、埃及、波斯等等。因为中国不象近、中东国家那样沙漠地带，国家的繁盛，固然和水利灌溉有关，但作为封建社会的基础——封建土地所有制，却始终是私有制，而不是国有制。那末，探究中国社会长期迟滞的原因，便必须从中

国历史说起。我以为中国历史的发展特点，是既早熟而又未成熟，奴隶社会如此，封建社会也是如此。关于这点，嵇文甫先生早在解放初期即提出中国奴隶制的早熟性。这个意见值得考虑的，即中国奴隶制的形成是以种族奴隶为主，征服者对于被征服的民族不是彻底的破坏、摧毁原有的氏族组织，不改变他们的生活环境，而系同其妥协之下，进行生产，如所谓“殷民六族”、“殷民七族”、“怀姓九宗”等，都是如此。这种牢固的氏族组织形态便难以顺利进行从种族奴隶到生产奴隶的转变。是以中国的奴隶制产生虽早，却因保留有较多的氏族社会的生活形态和生产方式，不易发展到成熟的阶段。尽管中国奴隶社会的文化颇为辉煌灿烂，青铜器的制造技术是很精致的，迄今仍为世所重，然其社会组织则仍停留于血缘关系之中，且影响到封建社会中来。中国的宗法制度即始自奴隶制时代，而发扬光大于封建社会。象这种早熟，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例而言，那可举出好多的早熟现象。中国的封建文化是世界历史上最发达的国家，辉煌灿烂。说她是早熟，那就是和欧洲封建社会相比，中国在封建时代就出现了大统一国家。土地买卖在世界历史上也是较早的，当战国秦汉之际，“除井田，民得买卖，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①。就是在均田制之下，仍允许有一部分的口分田可以买卖。宋元以迄明清，这种土地买卖更见频繁，农民还分享有部分的土地所有权，如所谓“一田二主”、“一田三主”等，并在法律条文上有所规定。这些应是预兆着封建社会将要开始崩溃，本是封建社会后期的事，而却在前期即已发生。农民早有相对的离土自由，中国历

① 《汉书·食货志》。

史上多次的流民之波，从北到南的大移徙，可不用说。就是在安定时期的农民移徙，亦极为常见。明代江西之民多向荆湖地区移徙。而清代则“湖广填四川”的俗谚，早为人们所熟知。他如闽粤多远赴海外，山东则向东北流亡。还有一些小村镇，他的人口亦非完全来自土著，有不少是从邻近乡县移来。重要的，我们还见到宋代以后，佃户可将借地归还地主，脱离佃户的地位，称之为：“辞离、退佃、起移”^①。明末清初佃户也有同样的自由，可以“驱牛荷耒，择地而住”^②。至于一般雇农则“主者得工，雇者得值”^③，来去自由，习然称便。这都是欧洲中古庄园制下所不能想象的。其在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方面来说，中国也是很进步的。四大发明可不用说，中国使用水力以进行生产，早在公元三、四世纪的魏晋时代，水碓即已发达。宋元以后，水车、水碓、水磨、水硙等使用于灌溉、精谷、制粉、纺织以及制香（香水车、香碓）、造纸（纸碓）等皆甚普遍。英国在十六、七世纪才开始用煤作为动力，然中国早在北宋时代（960—1127），“汴都数百万家尽仰石炭，无一家燃薪者”。^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中国封建经济十分富庶繁足，商品生产早就出现，对于商业、高利贷的禁律在中国古代人的道德观念中已不复存在。尽管“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贵矣”，这也是一种早熟现象。至于货币的使用和铸造更有悠久的历史，且是世界上首先行使纸币的国家，白银流通很为广泛，封建社会的三种地租形态同时并存。封建时代的国内

① 参考宫崎市定《从部曲到佃户》，《东洋史研究》29卷——30卷1期。

② 康熙《滑河县志》卷1。

③ 乾隆《林县志》卷5、风土、“集场记。”

④ 庄季裕《鸡肋篇》。

市场，特别是宋元以后的城市，如汴京、临安、大都等，不论在面积和人口的集聚程度上都要高于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这种迹象应该承认它是早熟的，可是为什么它又是不成熟呢？因为早熟，某些进步的生产力，往往和其它社会，政治诸条件不相配合，于是这种高水平，在有些方面却是有害的。迷恋于现有的成就，夜郎自大，天朝天下第一，这沉重的历史包袱，很容易妨碍从这种结构转变为另一种生产方式的努力，或走上其它的道路。

首先，中国的大统一是由地主阶级来实现的，而不是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强烈的保守、因袭思想和庞大的官僚机构相结合，使得这个统一国家的前途，只能是专制和愚昧，而不是科学和民主。中国土地虽可以买卖，但不是很自由的，在法律上，习惯上还受着乡族势力的干涉；地主的取得土地，不纯是依财买田，有的是恃势横夺，并且还占主要地位，所以这种土地买卖显然是不彻底的，不成熟的。同时，土地可以买卖，对于整个社会风气都有深刻的影响，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求田问舍”，是中国地主的理想；而“醉卧沙场”，则是欧洲骑士的归宿。因为骑士们只有远征、掠夺、追求战胜品和土地才可积累财富。反之中国的地主只要守住家门，收地租，放高利贷，财富便会滚滚而来。再则土地买卖又阻碍中国封建经济的成熟发展。在欧洲只有封建贵族才有可能与土地发生关系，于是社会上聪明才智之人都去经营工商业，中国则否，这是东西方历史的差异点。农民一面有相对的离土自由，可以辞离、退佃、起移，不那么严格地隶属在土地上面；其另一面，则人身依附关系仍十分严重。清初“凤颖大家将佃户称庄奴，不容他适”，徽属婺源也还有随田佃客的风俗，即将佃户随田转卖，

勒令服役。①其他佃农奴隶化的例子甚多，不遑备举。同时，我们又必须承认人口虽不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但它会促进或者延缓社会的发展。明代以后，过高的人口增长率颇不利于生产的发展。明初全国人口约有六千五百万，到了明末增加一倍。尤其值得注意的，即自清嘉庆五年(1800)的三亿又激增到道光三十年(1850)的四亿四千万人②。这种高速度的人口增长率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不相适应的。不用说，这对于社会发展会起延缓的作用，更加恶化劳动条件，也影响到生产关系的内部结构。本来，农民的相对离土自由，人口的大量徙，对于解决人口过剩，缓和阶级矛盾，开发新经济区是有作用的。亦因当时政治、社会诸条件的缺乏，出现脱节现象，致使这些移民也没有产生积极的经济效果。如闽粤之民早有移居海外的传统，前往东南亚各地。可是他们在海外多受外国殖民者的压迫。吕宋华侨于十七、八世纪前后，曾屡遭迫害，屠杀泉漳之民死者数万人。其在国内，海外移民亦得不到王权的庇护。明清两代专制政府的锁国、禁海，使有些移民从商业或对外贸易上面所积累的大量资金，不能立足于本土，生根滋长，从事新的产业，反而转向地主经济的倾斜发展。其另一支移民，则向浙、赣、粤、皖、湘、豫、鄂、四川山区发展，如棚民、菁客、蓝徒、炭党等，经过这些移民的积极开发经营，在个别山区里，孕育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可是他们的迁徙，是既自由，又不自由，终受到当地封建地主和政府的压迫，而不能继续成长，终于夭折、中断了。其结果遂导致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因素早已产生，然长期以来始终未能达到成熟的

① 参考康熙《江南通志》卷65，艺文。徐国相《特参势豪勒诈骗疏》。

② 参考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

阶段，也使中国封建各阶级无论是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前辈都发展得不够成熟，形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这是我们研究明清史的应注意的方面之一。

其次，研究中国历史必须进行综合比较研究。马克思在谈到欧洲封建社会时，曾指出日本的封建社会接近于欧洲的纯粹封建社会，而和其他的东方国家有所不同。上面我已约略述及中国封建社会的情况，是既早熟而又不成熟。它的社会变革过程，从氏族制到奴隶制，从奴隶制到封建制都不是十分彻底的。而游牧民族的不断内侵，时而带来落后的社会制度，也给予中国社会以一定的影响。有不少地方是和前社会的残余生活形态采取调和、妥协之下而成立的。这种残余既为地主阶级所利用，又适合小生产者的需要，因而保存最多，造成复杂化。故在这个社会里，地主阶级对于农民的控制不仅用经济的剥削，政治的压迫，还利用中国历史的早熟性保留有较多的奴隶制和村社制的残余，并通过上层建筑，国家机器，即庞大的官僚机构来进行调节、控制。通过科举制、捐纳制的办法，挑选继承人，按地区分配名额，并设置“商籍”、“客籍”，“棚籍”诸种名目，让各地方的地主分子和商人都能得到入仕、晋升的机会，分别收取到各级的政府中，以充实封建国家的政治机构。科举制较之门阀制的优越点，即在于这班经过科举出身的人，不一定都是大贵族阶层，他们有的比较熟悉民情，了解民间疾苦，为维护封建统治，不时进行改革和更新。这比较那班门阀子弟养尊处优，不辨菽麦，只懂得荒淫与无耻的人，是有所不同的。为镇压被统治阶级和本阶级内的不纯分子，中央政府又采取清官与酷吏的两手，有张有弛，进行控制，形成为一个极具弹性的封建社会。这和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等级森严、以

土地尽可能分给多数的臣属为特征的欧洲和日本的纯粹的封建社会，显然有某些不同。这种韧性，又表现于“古者四民分，后世四民不分。古者士之子恒为士，后世商之子方能为士，此宋、元、明以来变迁之大概也。”^①这种社会各阶层之间的互相流动、移换，很不利于本阶级的成熟成长。一个固定，一个流动，其对于知识经验和社会财富的积累，其后果是不同的。同时，中国的商品生产早有悠久历史，商业、高利贷已成为封建经济所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特别是中国的土地买卖，给予商业资本以一个很好出路。而它的害处，是在于过早地把土地开放给商人，造成富者之子，不复为商。他们且购置田产、房屋及其它，而升入大地主及城市富绅阶级。于是这个社会既有自然性的主要面，又有商品性的另一面。小生产经济始终保有活动的余地，阶级对立尽管十分尖锐，却又富有融通性，可以不急于要求生产力和生产技术的急剧变革。也可以在不急于要求冲破生产关系束缚的前提下，让原有的社会结构得以继续生存下去。其间生产力且有所发展，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封建文化。

其三，由于中国历史的早熟性，由于生产力始终是最革命的因素，尽管中国的封建经济在其前进的道路上遇到了种种的阻力，然而它毕竟仍能曲折地向前推进。只是它的发展极不平衡，进度不是直线上升，而是有发展，有迟滞，有萌芽，有中断，有夭折，有继承，这又是明清社会的另一个特点。同时，我又认为，中国的经济区域是多元的，有平原，有山区，有沿海，有内陆，各自发展，并在不平衡的规律支配下，曾出现某

^① 沈垚《落帆楼文集》卷24，《费席山先生七十双寿序》。

些矛盾的现象。在落后地区有进步因素，在进步地区有落后因素，彼此互相限制，互相激荡，互相对立，而又互相抱合在一起。这种种矛盾的现象，在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和意识形态诸方面都有所反映。其最明显的，即在明代中叶以后，在经济上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因素，及与此相对应的社会风气的变化。我记得龚定庵先生有几句很中肯的话，颇不为人所注意。他说：“有明中叶嘉靖及万历之世，朝政不纲，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钱。……风气渊雅，……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后世士大夫所必不能攀跻者。不贤识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①。龚氏的卓见，如实地指出明末社会的变化，不是衰世，而是新时代的开端。一向为人们所轻视的商贾、优伶等渐从儒家的思想束缚下解放出来，树立新的道德观。妇女地位也有一定的提高，李卓吾不是公开反对当时社会上的一种谬论“以女人学道为见短”。素来不涉政治的宗教界，如僧达观亦起而反对矿税，并且献出了生命。他们不遵孔子家法，“举业至于抄佛书，讲学至于会男女，考试至于鬻生员，此皆一代之大变”^②。这种新情况的出现，是和明代社会经济的变化相配合，我们从大量的地方志以及其它的著作，都得到详细的印证。兹略举数例如下：以徽州为例而言：“正德末嘉靖初则稍异矣。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操货交接，起落不常。能者方成，拙者乃毁；东家已富，西家自贫；高下失均，锱铢共竞；互相凌辱，各自张皇。……至嘉靖末隆庆间，则尤异矣。末富居多，本富益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起者独雄，落者辟易，资爰有

① 龚自珍《定庵文集》文4，《江左小辨叙》。

② 顾炎武《日知录》卷18，“艺文”，